

作家访谈

我脚踏实地、心无旁骛地读书、教书和写字,不擅长人际关系,不喜欢阿谀奉承,还算勤奋,不是自己多么聪明,多么超群,是转益多师,人世自有公道在。

马瑞芳:心无旁骛地读书、教书和写字

本报记者 舒晋瑜

马瑞芳的家庭在山东大学几乎是一个传奇。七兄妹都是重点大学毕业,除了马瑞芳,都是学理工专业,七兄妹全是“山大帮”,唯一一个是山东大学毕业的妹妹,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在山东大学当老师。马瑞芳的大姐、三哥和马瑞芳同一届山大毕业,成访吾校长在欢送1960届毕业生晚宴上,特意坐到他们那张回族同学专桌。

其实马瑞芳最早的愿望是当乒乓球世界冠军,后来没有当成;她也热衷于创作,90年代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,学术界和文学界都称赞;可是她最终专攻于古典文学研究,并趟出了一条从经典到大众的成功之路。

可是,谁又想到,这位著作等身的女中豪杰,小时候造句最通顺的是“只要……就”呢?

“只要一写作业我就头疼。”马瑞芳回忆当年的趣事,开怀大笑。年过七旬的马瑞芳,2019年先后出版《书里书外话经典》(4卷本)和家族史长篇小说《煎饼花》。这位创作和研究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学者,仍然保持着蓬勃活力的创造力。

马瑞芳:您在《马老太语录》中谈到,从小母亲就用“红楼”“聊斋”来教育自己。母亲的兴趣和看法,是否影响到您后来的研究?

马瑞芳:我母亲是大家闺秀,自幼喜欢读书,《唐诗三百首》《今古奇观》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……八十多岁还看文言文的《聊斋志异》。母亲爱拿聊斋故事《细柳》虎妈育才说事,用“自在不成才,成才不自在”教育我们,她的教育影响到我后来的研究。我大学五年《红楼梦》是枕边书,大三二年级写了第一篇论文《妙玉的悲剧》,同学们说要写主要人物,后来我又写了《贾宝玉批判》。这两篇论文我都保存着。

母亲不懂红楼梦版本,但她当年给我讲《红楼梦》时,认为贾母和凤姐一定会成全宝黛爱情,不会同意掉包计。她的观点对我很有影响。我后来在山东卫视讲《红楼梦》,我的姐妹就说,这家伙又抄家!抄谁的?我母亲的,当年母亲讲过的。

马瑞芳:为什么从妙玉写起? 马瑞芳:妙玉是有高度文化素养和很高精神追求的才女。她的气质、才华、浩解、孤僻,遁入空门却追求美好诗意的生活,曹雪芹在前80回中,用不多笔墨做了精彩表现。我认为妙玉和贾宝玉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爱情关系,她青春和热情勃发,体现在和贾宝玉的友情上。妙玉在宝玉跟前心情愉悦,妙语如珠,娇嗔如唱,口舌生风,完全是青春美少女的腔调。贾宝玉的到来,在这里比厄尼孤寂的心灵中,投射进一缕青春的阳光。

马瑞芳:您最近出版的《煎

煎饼花》,和此前出版的散文集《煎饼花儿》完全不同吗?为什么起个去近乎雷同的名字?

马瑞芳:完全不同。《煎饼花儿》是散文精选代表作,《与共和国一起成长:煎饼花》是新创作的家族史长篇小说。之所以命名《煎饼花》,是因为煎饼在作品中出现多次。煎饼见证了母亲从千金小姐到任劳任怨的贤妻良母的重要转变,卷裹着马家新旧中国两重天的风云人生。我写到自己最想写的父亲、母亲、祖父、外祖父、七个兄弟姐妹、“冯叔”冯毅之等人,写到非常好玩的地方,我自己哈哈大笑,写到悲伤的事情泪流不止。这部作品一个月写出来了,写亲情像开了闸的水。

马瑞芳:《煎饼花》里您最想写的是谁?

马瑞芳:最想写的是父亲马楚珍。父亲是青州名医,解放前无偿给穷苦百姓看病,支援地下党工作,1946年参加革命,后任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,三届全国人大代表,1950年曾在怀仁堂给毛主席敬茶。父亲结交中共抗日英雄,地下党地方领导,曾让马家成为特务的眼中钉,肉中刺,新中国建国初特务曾密谋抓住“马胡子全家”,开刀问斩,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,在家里推崇的却是“男女平等,女略高于男”,有一盘好吃的,都是父亲先端给母亲。母亲的脾气非常烈,父亲的脾气非常温和,像贾宝玉一样,父亲深爱着母亲,因为母亲洁身自爱,护持父亲一心奉公。

马瑞芳: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不是散文能够概括的。从1985年到1992年,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新儒林》。我先生牛运清给改成《蓝眼睛和黑眼睛》,王扶林导演为17集电视剧连续剧。很多红学朋友看完小说后劝我不要研究《红楼梦》了,改写小说,说你再写长篇小说,我们都给你提供素材。他们不光提供素材还给起名。有个女红学家说,莎士比亚在《奥赛罗》说过“嫉妒是绿眼妖魔”,现在学术界最大的特点就是红眼病,第二部小说干脆就叫《红眼睛和绿眼睛》。但是出版社认为小说的立足点还是写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的精神,讨论论是否改名,还是牛老师,改成《天眼》。

马瑞芳: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弢等主编的《中华文学通史》在当代卷专门研究了您的小说。可见您的小说在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。现在回头看看自己的文学创作,您愿意作何评价?

马瑞芳:2004年在德国举行“亚洲文学研讨会”上,柏林大学教授爱娃·穆勒报告了《马瑞芳和她的中国

校园文学》。有评论家说,一部小说能把一两个人物写活就很难得,马瑞芳的小说写活了二十多个人物。这三篇小说之所以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,一方面是小说题材少有人写,另一方面,小说家创作,一般是第一本写得好,后边写得弱。我是知识分子家庭,长期在大学工作生活,对这个题材熟悉。评论家认为三部小说,一部比一部好。

马瑞芳:后来您专心搞研究,是否觉得遗憾?文学创作和研究,您更倾向什么?

马瑞芳:我一开始受命研究《聊斋志异》,到2004年我想该转向《红楼梦》了,没想到去百家讲坛之后,连续写了很多本古代文学的书,根本停不下来。写长篇小说是费脑子费精力,进入创作状态后小说人物总在脑子里转。所以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,我先生说,你现在不能再写长篇小说,不然又会累出病来。但我还是觉得搞创作更好。

马瑞芳:1980年,您开始写作《蒲松龄评传》,萧涤非先生认为您的作品具备三个特点:辩士的舌端,侠客的箭端,文士的笔端。为什么说这么说?

马瑞芳:萧涤非先生喜欢我的作品,对我支持特别大。他那么有名的专家,很多人找他采访,要谈怎么治学,他都不谈了。我去找他谈足球,他说:你要,我和你谈!他曾是清华大学足球队队长,获得过华北足球大赛冠军。采访完我在《体育报》上发了一整版,臧克家吴祖缙看了写信打电话给萧涤非。臧克家还专门给我的随笔热情题词,称“瑞芳同志是我欣赏的散文名家”“大加鼓励,我受宠若惊!萧先生开玩笑说:大作家的《余修老伯》把《齐鲁晚报》广告都挤掉了,他们认为创作有这么大影响,能写为什么不写?萧涤非先生喜欢我用散文笔法写蒲松龄,认为带来很新的角度。

马瑞芳:您认为女性视角给研究带来什么?

马瑞芳:1993年我在香山参加古代文学国际研讨会,与会学者中中国外国各五十人,中国有两位女学者,外国有十位女学者。我提交论文《女性视角在三国水浒中的空前失落》。《三国》中母爱和爱情都贴了“权、忠、义”的标签,《水浒传》中女人是祸水。《三国》《水浒》女性意识的失落导致历史性别感甚至艺术创造全局意义的损伤。我讲了十五分钟,六个国家男专家都来批判我,热烈讨论一个多小时。我称之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性别突围。因为我是女性,是作家,以当代作家心态搞研究,看到的就是和他们不一样。

马瑞芳:您怎么回应这种批评?

马瑞芳:他们提的对的我会吸收,批评只会丰富自己、完善自己、扩大视野。我回说,刚才大家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,但是我坚持我的观点,我还要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阐发我的观点。阐发到哪里了?下次学术会议提交论文《蒲松龄的“情爱幻想和男性乌托邦”》,我用挑战的态度看他们,心想我才不信你们的话,我要坚持自己的观点。会议结束后,德国专家爱娃·穆勒和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邓绍基一起坐车,邓先生对德国教授说,马瑞芳很有学术自信心,善于吸收别人的观点。

马瑞芳:程千帆先生曾经指导您写《聊斋志异》创作论。吴祖缙先生也对您有过帮助,从这些名家身上受到教益最多的是什么?

马瑞芳:《聊斋志异》的研究得到了两位高手的指点,吴祖缙和程千帆。程千帆写了封信,说《蒲松龄评传》详实而有文采,他鼓励我说,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。

程千帆先生来主持萧涤非第一个博士的答辩。我去见他时谈到《聊斋志异创作论》写了两遍感觉还是隔靴搔痒。他说你如果把《聊斋志异》的例子换成《红楼梦》行得通吗?我说行得通,他说这就是问题。我才知道《聊斋志异》中神鬼狐妖是最重要的。

我在写《聊斋志异创作论》过程中,去北大请教吴祖缙。他女儿告诉我,吴先生很高兴,一早打发外甥去西单买羊肉。谈一上午,午饭边吃边谈,饭后继续谈,给我上了一天的聊斋专题课。吴先生对我最大的帮助,是告诉我研究聊斋不要搞大而无当的理论研究,要一篇篇细读,才能读出声儿来。我根据吴先生和程先生的指导,在第三稿加了好几章“神思篇”。吴先生还告诉我,不要光谈文学,还要结合社会经济。后来这部作品出版后获了很多奖,最近又改成《聊斋艺术高峰论》由齐鲁书社出版。

马瑞芳:梁晓声在《孤鬼启示录》中,揣测曹雪芹是看过《聊斋志异》的,您也写过《从〈聊斋志异〉到〈红楼梦〉》。

马瑞芳:我在2004年出版《从〈聊斋志异〉到〈红楼梦〉》,从八个方面谈到《聊斋志异》影响了《红楼梦》。《葬花吟》受到《聊斋志异·绛妃》“讨风神傲”的影响。不管是《讨风神傲》还是《葬花吟》,都是对现实社会的抗议。《聊斋》的香玉是花仙,不就成了绛珠仙子的原型?《聊斋》有个不起眼的真生,交了一个朋友叫贾(假)生,真真假假,不能看出对《红楼梦》的影响吗?《聊斋志异》细柳和红楼人物凤姐也有很多共同点。但是凤姐身上所包容的社会容量、思想容量,反映社会的广泛深刻程度,不是聊斋人物细柳所能比

的。红楼对聊斋的承传还表现在他们共同企盼的乌托邦式理想乐园:聊斋的海底龙宫和红楼的大观园。蒲松龄和曹雪芹,都幻想乌托邦式乐土,用小说创造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,又因为理想世界的丧失而更加悲哀。《聊斋志异》还能梦想,还相信梦想;《红楼梦》却梦醒了,且无路可走。

马瑞芳:2005年,您走上百家讲坛,提倡“传统文化走向大众;深入浅出雅俗共赏”。您是百家讲坛为数不多的女性“坛主”,也是人缘最好的“坛主”,在《百家讲坛》,这张“魔鬼的床”中,主讲人粉墨登场,比百家讲坛还好看。您写得特别有趣、真实,易中天总结主讲人受欢迎的原因是见解、学问和个性,并且三方面您都具备——您认同他的评价吗?您觉得上百家讲坛,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?

马瑞芳:2004年我62岁,在大学里讲了二十多年,写了一些高堂讲学的专著,18万字的《蒲松龄评传》写4年,《聊斋志异创作论》也写4年,只印3000册,20年都没卖完。这些书都是在古代文学研究圈和极少数当代文学研究者中流传,其他人根本不看。百家讲坛播出的《马瑞芳说聊斋》一开始印了七八万册,《马瑞芳说聊斋》开印5万册,当月再版。百家讲坛使得我明白,我应该用简洁、通俗的语言,让文章雅俗共赏,把自己的研究告诉更多读者。

我当时写《百家讲坛》,这张“魔鬼的床”,易中天特别支持,主动请缨给我写序。我写易中天的散文《公鸡中的战斗鸡》一上午就写完了。易中天十天还没写完序,我给他发信息说,十天写不出两千字的序,请问向熊它妈是怎么死的?结果他很快发来一篇两万字的序。于丹听说后感慨:“天哪,他想啥啥夺主吗?”阎崇年的治学严谨,于丹的出口成章,易中天的知识广博,王立群做学问的聪明,都写进书里了。

马瑞芳:您说过越来越不喜欢蒲松龄,为什么?您有没有越研究越感兴趣的人物?

马瑞芳:蒲松龄有酸腐的男性观,比曹雪芹差远了。我最喜欢的是林黛玉。我觉得人在世,就是有什么说什么,就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。林黛玉是真心爱祖母,但她从来不表现,没说过一句讨好恭维贾母的话。

马瑞芳:在《书里书外话经典》(4卷本)中,您对我们认识的经典作品有哪些颠覆性的评价和认识?

马瑞芳:四大名著我从小就在大学里又讲了三十年。我在初中时看《西游记》看得入迷,读到《三国演义》诗词略过不看,那时就想如果有一本书指导我来读,我会读得很好。十几年前,我在《中学生阅读》杂



《书里书外话经典》,马瑞芳著,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,392元/套;《煎饼花》,马瑞芳著,青岛出版社2019年8月,45.00元

志开专栏引导孩子读《三国演义》,也好多次到中学做报告,我知道学生想了解什么。《西游记》要读懂前七回,《红楼梦》要读透前五回。我认为最重要的要讲给孩子听,现在教育部要求中小学生在读经典,根据我自己从小学初中遇到的阅读困难,我写了这4本书,是辅导初中以后的学生阅读,很多内容我想都是必考的,比如《三国演义》的主要线索、主要人物,讲到哪个人物,应该联想到什么词什么成语,也针对考试有可能出的题目做了解读。我在让经典走向大众的过程中做了一些努力,知道阅读方法,知道阅读价值在什么地方,这就是《书里书外话经典》希望起的作用。

马瑞芳:重新解读经典,您的创作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突破吗?

马瑞芳:我想第一要抓住四大经典的精髓。孙悟空永不停止的战斗精神,《水浒传》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传奇,《三国演义》中讲诸葛亮的智谋,更主要是讲他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的精神;二是抓特点,《三国演义》和真正的历史有什么区别,最重要的人物是哪些,《水浒传》是英雄传奇,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哪些对人们有影响?提供学生们理解的思维价值在哪里,三是语言一定要写得通俗易懂。

马瑞芳:您在名著解读中,收获了什么?

马瑞芳:最受益的,是使我的文学创作不至于眼高手低,有标杆在那里。

马瑞芳:回望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创作,您愿意怎么总结?

马瑞芳:脚踏实地、心无旁骛地读书、教书和写字,不擅长人际关系,不喜欢阿谀奉承,还算勤奋,不是自己多么聪明,多么超群,是转益多师,人世自有公道在,老天爷饿不死馋鬼。

冯舒、冯班仅为一介布衣,以他们的身份和学术影响力要想在诗坛搞些名堂,不免有些剑走偏锋。

布衣文人的学术构建

詹福瑞

小艳2010年考取我的门下,入学之初即与我积极探讨博士论文题目,最终选定饶有趣味的冯舒、冯班为研究对象。冯舒、冯班是为兄弟二人,早年曾共拜于钱谦益门下,也是“虞山诗派”的中坚力量。兄弟二人虽与钱谦益相交甚深,钱谦益因系牢狱之时冯舒还曾奔走相救,却受牵连入狱,但二人的诗学旨趣却与钱谦益相左:钱谦益博取兼唐宋之余,取径于冯舒;冯舒、冯班则以晚唐、西昆为圭臬。相左的诗学旨趣不仅导致师徒关系一度紧张,以致于冯舒蒙受冤狱之时,钱谦益竟无只字片语;同时也导致“虞山诗派”

分作两途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在诗学取向上二人背离了钱谦益的路数,但学诗、作诗、传诗之法却与钱谦益并无二致,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激烈和偏激些。当然这也与二人的身份地位有关。不同于钱谦益内阁尚书的政治地位和四海盟主的学术地位,冯舒、冯班仅为一介布衣,虽早年追求于功名,在明清易代之时愤而弃之,终身落寞于贫贱之尘。所以,以他们的身份和学术影响力要想在诗坛搞些名堂,不免有些剑走偏锋,又加之二人桀骜狂狷的性格特征,更是难容于时俗,或坐于席间而大骂,或伫立门前而自哭,

人多以痴狂目之。但他们偏激的言辞却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,收获了很多追随者,冯班的《钝吟杂录》至今亦津津不疲。同时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布衣精神,即“虽为一介书生,却胸怀济世之志,自任当世之责,平交王侯,蔑视权贵,循道践义,安贫守节”《布衣及其文化精神》,清华大学学报,2011年第2期)。虽然他们渴望功名成就,建立不朽的永恒大业,但在国难危机之时,他们更看重道义和中国文人的操守,弃场屋坠布衣就是他们为明王朝所作的坚守。

一同于狂狷的性格,二人做学问

的路数也是偏“笨”的,坚持一切皆从文本中来,从最基础的抄书、校书开始做起,然后汇集融入诗学观点的评点。二人在抄书、校书、评书时一以古本为准,甚少随意涂改,体现了严谨的学术精神,因此二人抄校的古籍不仅成为历代文人争相收藏的热点,也成为众多藏家判定版本优劣的依据,客观上为善本图书的保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二人以文本结合诗论的传播诗学的方式也很具有研读意味。纯理论的推广过于抽象,不太好操作实施,结合文本之后以诗代论,以论作诗,不仅易于上手,也可借助文本的推广扩大诗论的影响,同时

对文本的推广也具有积极意义。

小艳的论文充分把握住了冯舒、冯班的性格特征、诗学特点和诗学传播方式,对冯舒、冯班的诗学理论、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,得出了很多精辟的论点。同时也看到了冯舒、冯班破而有承、立则不足的局限,并没有一味地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叫好。而且小艳也沿袭二人以“笨”功夫做学问的方式,撰写论文之初,即远赴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常熟图书馆查阅资料,国家图书馆更是她长期驻扎之地,几乎摸遍了冯舒、



《冯舒、冯班诗学研究》,周小艳著,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一版,76.00元

冯班诗文集的所有注、评本,以及冯舒、冯班抄、校、评的所有版本,并以此为线索翻阅其他学人的抄、校、评本为判定冯氏本的版本价值提供了扎实的依据。

五位陕西籍诗人,不同的诗歌风格,却在当代诗歌的路上慢慢勾勒出一幅清晰可见的未来图景。

冷峻而严正的现实之光

孙开

小镇青年,其实并非一味地选择自己舒适的安全地带而高枕无忧。他们在自给自足的同时,也会选择充实自己。条条大路通罗马,无论选择何种方式过一生,结果都会归于寂然,但事实上他们依旧是当下社会的中坚力量。“方向诗丛”是一次对于诗歌面貌的革新,对于这几位陕西籍诗人,他们从自我经验与个人立场出发,探求诗歌可能的发展方向,为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的诗人树立一种先锋而立体的依循范式。以诗人生活的地域为主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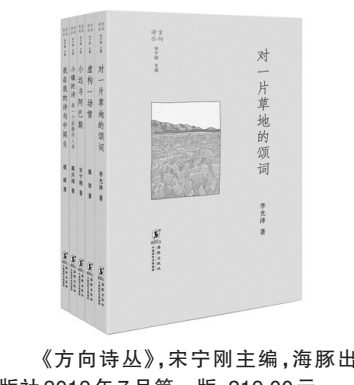
地来搜集素材、潜心创作、发现美好,不管是土地、山川、庄稼、村民……每一种歌颂的事物又有他们那个年代的独特味道。诗人宋宇刚《小远与阿巴斯》突破以时间为限制的束缚,而转换以内心体验和写作倾向为主。《梦》一首用间接的方式与辞藻阐释梦,“你从纸后走过。从初春到深秋,窗棂上闪动着你的身影。冬日,红灯笼挂满枝头,照耀你远行的路”,将梦喻为纸、红灯笼,都表现出看透与参悟之感以及照亮现实的意义,

注重自我剪影式的描述,而非直接道出梦的字眼和意义。又如《冬天》中“风和灵魂,渴望,比这儿更远,永远孤单”,用近乎模棱两可不知所云的字词撞撞,渴望望着新生、柳暗花明,或是一个明媚的春天……孤单象征一切归于沉静与安然,孤单与渴望恰将冬天的净与新、冷与暖衬托出来。从《我在我的诗句中诞生》中,诗人以直抵内心深处的文字揭露当代人们内心情感与心灵困境,但从辑一至辑五的标题可看出诗人不随波逐流的勇气以及诗歌的

字里行间表现出的张力。破破的诗歌风格与朦胧诗派有些相似,主要表现为自我形象的主体性与独特的意象艺术,主要以描述性、直白式的写作方式折射心理现实。比如《在唐朝》从舞剑、边塞到喂马、劈柴,从单一到对老年的父母,从历史维度横跨到现实世界,增强读者尽情想象的空间。

诗歌讲求韵律,但并非所有的诗歌都整齐划一。每一个诗人都拥有自己的方向。“方向诗丛”从一定意义上折射出这些“70后”“80后”

青年诗人对当代诗歌的新尝试。五位陕西籍诗人,不同的诗歌风格,却在当代诗歌的路上慢慢勾勒出一幅清晰可见的未来图景。“小镇青年”也可理解为普通青年或文艺青年,他们已不是“一家吃饱,全家不饿”的自给自足者,也不再是一群寄人篱下、曲高和寡的“打工者”,而是怀揣着自我志向与理想的追梦人,在各自的轨道上奔驰。正如五位诗人的诗歌一样,自由而有韵味,温暖而有力量。从当下“小镇青年”这一较为新颖的群体



《方向诗丛》,宋宇刚主编,海豚出版社2019年7月第一版,219.00元

而言,理想的高度需要把握,现实的维度需要正视。唯有将理想与现实适度而适宜地融合,未来的路上才能产生更多的恢弘可能。